

北汉千佛楼碑

□ 张 丽

北汉千佛楼碑,位于太原市西南的天龙山圣寿寺^[1]碑廊内,全称“大汉英武皇帝新建天龙寺千佛楼之碑铭并序”,刊刻于北汉天会二年(975年)。

北汉立国短暂,从神武皇帝刘崇称帝的乾祐四年(951年)始,历经孝和皇帝刘承钧、少主刘继恩,至英武皇帝刘继元广运六年(979年)降宋,北汉历四主,仅存二十九年。北汉是十国时唯一在北方建立的政权,疆域范围狭小,《资治通鉴·后周记》卷第二百九十载北汉“所有者并、汾、忻、代、岚、宪、隆、蔚、沁、辽、麟、石十二州之地”,还不及后唐的河东全道,仅为现山西中部和北部。因地域限制,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,遗留或出土实物颇为少见。而千佛楼碑历经一千余年的风雨,现仍得以保存,其历史和文物价值不言而喻。

作为北汉重要碑刻,该碑历来受到金石学家

及学者的注视,清王昶《金石萃编》、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、孙星衍、邢澍《寰宇访碑录》、胡聘之《山右石刻丛编》、刘大鹏《晋祠志》、《山西通志·金石记》等书均有记述和著录。该碑碑文虽多有漫漶不清之处,但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及和文物价值。碑高204、宽102、厚31厘米,正文25行,行67~72字,行书。尚书左仆射李恽撰文,翰林书令史刘守清、王廷誉书丹撰额。碑文记载了北汉睿宗刘承均、英武帝刘继元在位期间营建天龙寺千佛楼之事。固然碑文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过多溢美之词,然而认真研读,可以看出许多重要信息。

一、碑文多处对

天龙山石窟及天龙寺加以描述

北汉睿宗皇帝刘承钧、英武帝刘继元两位君主对天龙山情有独钟,在位期间多次修葺寺庙。碑文中对寺庙多有描述,修缮寺庙的记载也有多处。

其一,“上有平址,东西仅五十步。北倚石壁,有弥勒阁,内设石像,侍立对峙……昔睿宗皇帝再加添饰,功用宛然。”这段文字描述了石窟所在位置相对平坦,石窟之外建有保护塑像的弥勒阁,内塑石像。睿宗时曾加以修饰。从记述情况看,描述的是现天龙山石窟第九窟当时的情况,该窟主尊塑像为弥勒佛。

其二,“次东有池水甚洁,澄湛凝碧,睹之恐耸。”这里描述的应该是今白龙庙西侧的龙泉,在第九窟东侧,泉水至今清澈,流淌不止。

其三,“驯岭西下,□□约三百步有高寺,榜曰天龙。”按其位置,寺指今圣寿寺。说明北汉之时圣寿寺名为天龙寺,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寺院的历史久远。



千佛楼碑

其四,“尝以公退休暇,与叔季诸王方驾接轡,礼谒精蓝。一岁之中,□□□数。上独於东序塑观音像一堂,其内幡花鬘盖,……每具斋祷,罔不乾乾惕惕,潜发明诚。”从以上记载看,刘继元在未即位前,经常到天龙山拜谒,并塑观音像。

其五,“至壬申岁十二月二十二日,诏有司于大殿后,正面造重楼五间,寻讎良冶,铸贤劫自拘留孙如来已降铁佛千尊……匀分龕室,各安上级。”壬申岁即972年,说明千佛楼始建于972年,其位置位于天龙寺大殿后,楼为二层,面阔五间,筑铁佛千尊分别放置龕内。

史籍记载,北汉皇帝崇佛,其中睿宗皇帝、英武皇帝尤甚。《十国春秋》中记载,刘承钧曾任命五台山僧人继颢为鸿胪卿,参与国家大事,而刘继元更是以继颢为太师兼中书令。而由碑文所显示的信息看,刘氏父子崇佛的举动跃然纸上,在天龙山上不但修建有弥勒阁、观音堂、千佛楼,刘继元更是多次亲自到天龙山礼佛,乐此不疲。

二、碑文所凸显的史料价值

千佛楼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分析碑文,可以看出其史料价值在于匡正了正史中有关北汉年号记载之误,同时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叙述。

《新五代史·东汉世家》中载,继元立,改元曰广运。《宋史·北汉刘氏》记,继元既袭位,改元广运。而仔细研读碑文,可辨出史籍记载与碑文相矛盾。碑文中曾出现三处记载与此有关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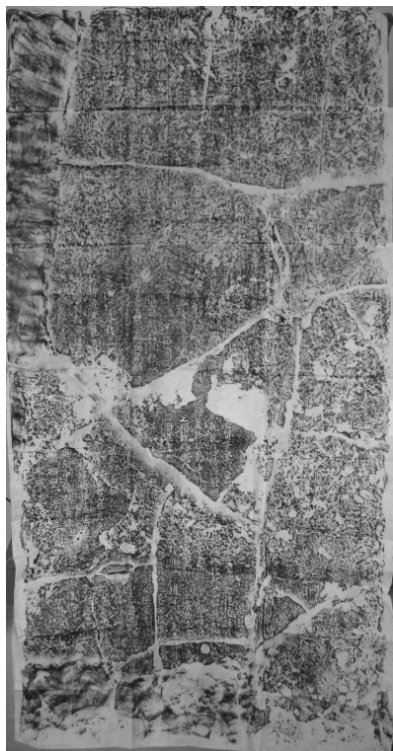
1. “时戊辰秋九月,嗣升宸极,立定倾危。”记载刘继元继位之事。

2. “上御宇之八年乙亥岁”,记载千佛楼修建完工之时间。

3. “广运二年乙亥岁”,记载立碑时间。

戊辰岁为968年,说明刘继元于968年继位,“上御宇之八年”指皇帝登基继位八年,乙亥岁为975年。从968年继位至975年正好8年;“广运二年乙亥岁”说明975年为广运二年。

按《新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记载,继元立,改元广运,应968年为广运元年,广运二年应为969年,庚午年。但这恰恰与碑文记载不符。碑中明确说明广运二年为乙亥年即975年,为此,我们应遵



千佛楼碑拓片

循碑文记载。同时也可以看出,刘继元继位后,并未改元,而是继续沿用睿宗皇帝刘承均天会年号,至974年才改元广运。而天会年从957年至973年共十七年,而非957年至968年的十二年。《十国春秋》作者清吴任臣据此碑记载最早提出修正《新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中北汉年号记载之误,由此凸显了该碑的重要历史价值。

碑文还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叙述。

其一,侯霸荣杀刘继恩,刘继元继位之事。关于此段历史,《新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均有记载。《宋史·北汉刘氏》记载了侯霸荣杀刘继恩之事,供奉官侯霸荣“乘继恩无备,白昼挺刃而入反扃其门,继恩绕屏而走,霸荣以刃搯胸拭之”。碑文用寥寥几十个字叙述了此历史事件。碑中记载:“未几,值仓卒之变,震骇非常,上独执雄断,入内平难,时戊辰秋九月,嗣升宸极,立定倾危。”这里“仓卒之变”即是指侯霸荣杀刘继恩之事,而且明确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为戊辰秋九月即968年。

其二,碑中对刘继元历任官职及碑文撰写者、题额者、监修千佛楼者官职进行了详细叙述,使我们对北汉官职有所了解,同时碑文对刘继元历任官职记载详于史籍,起到了与史籍记载互补

的作用。

碑文载,睿宗皇帝时,刘继元任检校司徒,归义府都督;不久,加检校太保,授右金吾卫大将军,充大内都检点;少主刘继恩时,加太师,行太原尹。不久又领侍卫亲军事。《十国春秋·英武皇帝本纪》载中,未有侍卫亲军事之记载。

碑文中记载,千佛楼的监修者为北汉重臣范超,其任宣徽北院使、永清军节度使、检校太保。

碑文的撰写者为李恽,其官职为特授守尚书令左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上柱国、陇西郡开国公。

书丹撰额者为翰林书令史刘守清、王廷誉。

其三,因北汉为一小国,与宋、北周、辽并存,并臣服于辽。关于北汉历史,见于正史记载,始于宋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、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、元脱脱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。正史记载中对北汉皇帝称北汉主或直呼其名,而碑中称刘承均为睿宗皇帝,刘继元为大汉英武皇帝,使后来者对北汉皇帝称谓得以知晓。

三、碑刻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

北汉为十国时北方的一小国,疆域范围比较小。由于时间的短暂和地域的限制,加之战火连绵,使北汉遗存至今的文物寥寥无几,稀缺性成为北汉文物的价值所在。根据目前刊布的资料来看,北汉遗留或出土的实物:建筑唯平遥县镇国

寺大殿;墓葬在20世纪90年代太原金胜一电厂发掘一座,2009年在晋源区晋祠镇青阳河发现一座^[2],碑刻幸存三通,分别为天龙山千佛楼碑、清徐龙林山梵宇寺记^[3]、平遥镇国寺刘继钦碑^[4](半截)。而千佛楼碑作为北汉名碑,不仅至今保存基本完整,而且解决了正史中北汉年号记载之误,同时也是北汉皇帝崇佛的佐证,其重要的文物价值显而易见。

[1] 圣寿寺,原名天龙寺。据《永乐大典》五二〇三引《太原志·太原县》寺观条记载:“天龙寺,在县西南三十里,北齐置,有皇建中并州定国(寺)僧造石窟铭。”天龙寺一名,从北齐至金代一直沿用,这可以从天龙山现存的北汉“千佛楼碑”和金正隆四年(1159年)《重修天龙寺铭》碑中看出,而至明代,寺庙名称发生变化,称为“寿圣寺”,明末清初又称“天龙寺”,至清同治二年(1863年)《补修圣寿寺序碑》后,称为圣寿寺。

[2] 该墓于2009年12月发现,墓室内存有壁画,并发现墓志一盒。从墓志记载判断,该墓应为北汉英武皇帝刘继元的太惠妃墓。

[3] 该碑位于清徐县马峪乡马鬲寺遗址内,碑名为“北京龙林山梵宇寺记”,立于北汉天会七年(963年)。

[4] 刘继钦碑位于平遥县镇国寺内,碑与镇国寺无直接关系。关于此碑的有关考证,见李裕民先生发表于《山西文物》1986年1期的《北汉刘继钦碑考》一文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太原市晋祠公园管理处)

(上接67页)

风格和绘画特点对于中国明代时期的建筑、雕塑、绘画艺术以及它们所承载的佛教思想都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,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参考文献

1. 柴泽俊《山西寺观壁画》,文物出版社,1997年。
2. 梁思成《中国雕塑史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6年。
3. 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《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》,中国展望出版社,1986年。
4. 张明远、白志宇、郭秋英、王丽雯、张卫东、陈志勇《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1年。

5. 熊雯《山西繁峙县公主寺东西壁水陆画内容考释与构图分析》,2008年。

6. 张炳杰《水陆画之神祇谱系及其社会功能的初步研究》,2007年。

7. 呼延胜《陕西现存世的几套水陆画的调查及初步研究》,2007年。

8. 苏金成《石家庄毗卢寺水陆画研究》,2006年。

9. 赵明荣《永安寺壁画绘制年代考》,2004年。

(作者系太原理工大学轻纺工程与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)